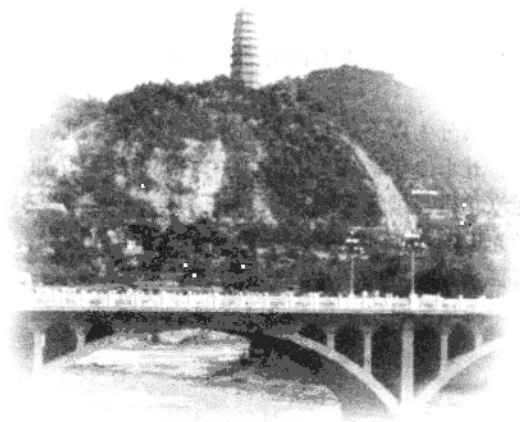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M
的故事
My
story

黄毅诚 著

My
我的故事
story



黄毅诚 著



作者近照

内 容 提 要

黄毅诚老部长是我国能源界和机械制造领域的老领导、老专家，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。黄部长 1939 年参加革命工作，经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洗礼，解放后，先在国有大企业任总工程师、厂长三十多年（期间派出国学习四年），后又在国家计委、能源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工作了二十余年。

2004 年初，黄部长将自己工作、生活的经历，以讲故事的形式加以回顾，各个故事单元间既相互独立，又互有联系，既谈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，又涉及了许多不为常人所道的故事。同时，也谈了许多对经济发展，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独特见解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全书分为以下单元：姐弟巧遇、父子相见、夜黑山路行、五十二年前在此相识、头朝下走路、单缸 10 万千瓦汽轮机、情系雪域高原、省柴灶、准格尔煤矿、世界最先进的煤矿、四管三不管、余热发电、续篇，并收纳有百余幅珍贵的照片。

前言

1939年初，我从湖北省枣阳县老家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参加了新四军，从那时算起，已过去了66年。66年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。回想逝去的岁月，发生过、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虽然过了这么多年，不少事情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，也可以当作故事讲给别人听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些认为有趣味的内容写了这本书，叫作《我的故事》。

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宽广的大国，说来就那么巧：1939年8月间的一个中午，我在竹沟镇的招待所遇到了分别两年的叔伯大姐黄茗。当时我去招待所找和我一起来的一位老乡，不曾想他已不住在原来的房间，此房间新住了一批从延安抗大来的同学。当我看到屋里已不是我要找的人时，急忙退了出来。这时一位抗大

女同学跟了出来，抓着我的衣领叫我的小名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她是我的大姐。正是由于巧遇到大姐，才使我有机会和 50 多个小孩一起去了延安。我们这批小孩离开竹沟镇不几天，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国民党反共的“确山事件”。我那时还不满 13 岁，若不是提前离开那里，恐怕在那次事件中，不是被打死，就是当俘虏。

人都是从幼年过来的，在一个家庭里，父亲的地位和威严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，可我在 14 岁以前没有见过父亲。我 1926 年 10 月出生，父亲 1927 年 3 月离家参加革命，那时我只有五个多月，所以在我的童年生活中，从来不知父亲是个什么样儿，直到 1940 年秋，父亲从新疆调回延安，我才在姑母的带领下和父亲相认。那以后的几十年里，父亲还是很关心我的——他从新疆回延安时就给我带了两瓶鱼肝油，到了假期又叫我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，平时还给我点钱叫我在市场上买些牛油，炼好后带到学校，吃饭时放点以增加营养，父亲回到延安那年我 14 周岁，我的个头只达到父亲的肩头，而在 1943 年我 17 岁时，一年就长了五寸，1945 年，父亲叫我和他一起从延安出来，后来又推荐我到了沈阳的工厂工作……

父亲的工作情况我不是很清楚，但他开朗的性格很值得大家学习。1930 年，他从苏联回来后不久就在苏北打仗受了伤，参加长征途中患了伤寒，后又参加西路军，九死一生，活过来也真不容易。从我第一次

见到父亲，就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身体很强壮的人，1965年还因胃癌开刀把胃切去三分之二，可他活到了99岁，生活质量也很高。我常对别人说要想长寿，第一重要的就是心情舒畅，对发生的那些不顺心的事要心态平和、大度，不要愁眉苦脸。

我对自己的母亲也尽到了儿子的孝道。母亲是农村姑娘，没有文化，1950年我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和我一起生活，在我出国学习时，转请我哥哥照顾母亲，但母亲的一切生活费用由我支付。我回国后，又马上把母亲接到我家。我老在想刘少奇同志在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一书中的一段话：“你若不能做一个好儿子，好丈夫，好父亲……，也很难做一名好共产党员”，我认为他说得很对。

我在延安生活学习了近六年，从1941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开始，我们这一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小孩，在一起学习了五年多。期间从延安大学中学部转到自然科学学院预科，又转到延安中学，后又考回自然科学学院，我们这批人不仅是同窗，而且是“同炕”（几个人睡在一个炕上），小孩们长期在一起生活，语言也相互同化了一些，所以我的口音是四不像，很难从我的口音中听出我是哪里的人。在延安期间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，但精神都十分快乐，在那个革命大熔炉里，大家都得到了锤炼。我们这批人在以后几十年中，虽然工作岗位和职位有差别，但都能作一名正直的中国人。

在同学中，特别是在延安最后的几年里，我和戚

元靖同志一直在一个小组学习、生产和生活，而且是同睡在一个炕上，所以我在书中特地由他引出一些事情来反映同学们一起生活、学习的情况。戚元靖同志曾任国家冶金部部长，很可惜的是，他比我小几岁，却先我到马克思处报到了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特别讲了我和爱人郭晶，从相识到相爱，经过了六年的考验，才结合在一起的经过。建立家庭、生育孩子、遇到大的政治运动和生重病，都会对两个人产生影响，我们俩人共同配合，也都顺利地走过来了。2004年10月，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，特地给我俩庆祝了金婚纪念。我常常对年轻人讲，为了能使家庭和谐，逐步加深感情，在一个家庭内也要相互尊重，也要讲“统战工作”。书中将我俩一生的爱情历程说出来，供青年人参考。

从1939年参加革命，我已走过了66年，回头理一理，走过的道路也是比较清晰和平稳的：从新四军到延安之后就是上学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，跟着父亲走到张家口，又转回学校和老同学们一起学习；1946年毕业后不久退出张家口，先在党校工作，后到工厂工作，不久又回到了党校；1947年，我陪继母到热河后，又分配到那里的党校工作，期间，参加了党校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热东地区进行土改；1948年底，转到沈阳的工厂工作；1951年到苏联学习；1954年回国，结婚后，在北京一机部四局工作了两年，之后，调到哈尔滨汽轮机厂；1965年，调到沈阳一机部

东北发电设备制造公司，接着经历“文化大革命”；1969年，先是借调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帮助工作，后在1972年正式调到北重厂；1979年调到国家计委；1988年调到能源部工作；1993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；1998年从人大常委会“毕业”，完成了全部的正式工作。

在这些年的工作中，我认为有故事性的事情，在书中尽可能地讲了出来。几十年的工作，想要说的事不少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认为重要的写出来。如在建国初期，国家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帮助我们掌握技术发展生产，在上海汽轮机厂试制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燃煤发电设备，按捷克的技术资料，有些零件无论工厂怎样努力也做不出合格的产品，如汽轮机铸铁隔板、动叶片等等。我经历了这个过程，把我了解的情况写进了书里，可供大家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。还有，我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举办的展览，我分管动力机械馆，中央领导来参观时当讲解员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中央主要领导们面对面地接触，我把有关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有趣的事也写入了书内。

另外，在工厂工作期间，特别是“大跃进”时期的工人们的精神面貌，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留恋的。哈尔滨汽轮机厂是1958年底才投入生产的，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，全厂职工鼓足干劲、奋发图强，生产了高压2.5万千瓦冷凝式汽轮机，单抽汽、双抽

汽高压2.5万千瓦机组，高压5万、10万千瓦冷凝式机组，超高压20万千瓦机组也基本完成了试制。为了提高产量（千瓦数），还生产了中压2.5万千瓦及6万千瓦汽轮机，完成了供列车用的3000千瓦燃气轮机。那时的工厂真是一天一个样，我们当干部的吃住在办公室，工人们在需要的时候也是倒大班（工作12个小时）。“大跃进”运动在我国农村，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，在城市也发生过一些不讲科学搞浮夸的事，但在我们工厂正面效益是主导的，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干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国办企业有许多正面的经验，主要是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。

在我的这本书中，讲到了我党的两位总书记——胡耀邦和赵紫阳，因为当时我在国家计委任副主任，和他们的接触较多。胡耀邦同志是一位政治家，他的话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，如他说煤矿要“有水快流”，受到一些人的批判，那是没有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他的话。他支持办小煤矿，当时国家建设资金十分困难，农民也非常贫困，农民们开些煤矿，一是支援了国家建设，二是生活也可以富起来，问题是如何领导这项工作。还有他支持我提出的用电做饭。对赵紫阳同志，我认为他在经济管理方面还是很有成绩的，如他支持在电价中加二分钱用来办电等等。他虽然是总理、总书记了，但还能听听下面的意见，特别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意见，这一点太可贵了。但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是犯有错误的，在那个政治风暴

的紧要关头，保证中央领导层的一致太重要了。

我在书中的用词、看法和观点，不论正确与否，都是我自己的感观，如有不妥之处由我本人负责。另外，由于过去的年限太久，有些事、有些时间可能有不准确和出入的地方，希望知情者提出来，我是非常感谢的。

《我的故事》这本书，原计划在2004年内出版，因故耽误了一段时间。2005年春节前后，我又写了一些有关能源方面的文章，现收集了九篇，登在本书的最后，作为续篇。其中，《对煤矿安全生产的看法》一文，总理看后，批示认为此文说到了煤炭安全生产的要害；《西藏电气化》一文，总书记也有批示，要求发改委在制定“十一五”计划时一起考虑。

1927年，父亲黄火青（前左）、大伯父黄山农（前右）、五叔黄民钦（后左）、姑母黄海明（后右）兄妹四人摄于武汉。



1949年12月，部分家庭成员在济南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黄毅诚、祖母张同勤、外甥女黄克难（抱）；后排左起：黄红军、大姐黄茗、郭晓萍（曼曼）。





1939年摄于延安，前排左起：二哥黄友学、二姐黄友群；后排左起：姑母黄海明、大姐黄茗。



小叔黄民醒。



1936年，大姐黄茗在
河南信阳女子师范。



1994年，大姐黄茗在北京。



1989年4月，黄毅诚重返河南确山竹沟镇留影。



1989年4月，黄毅诚在河南确山竹沟镇竹沟革命纪念馆前留影。

父子相见



1940年，黄毅诚（右一）与父亲黄火青在延安相见后的第一张合影。



1941年春在延安，前排左起：二哥黄友学、黄毅诚；后排左起：姑母黄海明、苏枚、黄火青。



前排左起：黄超、母亲郭瑶璞、大哥黄友若；
后排左起：刘万斌、二哥黄友学。



70年代，亲属合影。左起：郭晶、马新、黄毅诚、黄火青、黄友若、黄茗。



80年代，亲属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黄克难、黄丽、黄洪波、苏知涯、黄碧波、黄松波；中排左起：郭晓平(曼曼)、黄友群、黄海明、黄火青、黄茗、杨月波、阎雪俐、郭晶；后排左起：黄卫津、黄友若、严夫、黄毅诚、苏涵。